

杨文汉:我对党和国家的热爱,以及对教育事业的敬重之心从未改变



杨文汉教授,男,1934年6月生,祖籍陕西西平,政治经济学专业首批硕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49年11月起先后在咸阳干校、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和研究生班、陕西省计委物资局、西安政法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学习、工作和任教;1979年回校工作,曾任理论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第一副会长、中国生态经济学理事、陕西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2003年3月退休。代表作《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史纲》《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重大步骤》等,我校政治经济学学科主要创建人。2018年荣获“西北政法大学功勋教授”荣誉称号。

亲近的话语、体贴的照顾、灵活的思维,所谓“阅历都写在脸上”,是经历过世间百态后自然呈现于面貌之上的睿智与和蔼吧!这便是我对杨老师第一眼的印象。

1949年,家庭经济的困难剥夺了一个孩子求学的机会,这让当时的杨老师很无助。也正因此磨砺出了他吃苦耐劳、发奋图强的坚毅性格,此后在面对学习深造的机会,杨老师总是倍加珍惜,积极争取。由此,在不断的努力和坚持下,他于195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并在1959年如愿以偿的在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深造。

在杨老师看来,这些经历是幸运的。愿意承认运气的人,往往是不计较付出的人,“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便是如此。

杨老师的学术生涯以解读马列著作作为起点,以服务经济建设为目的。他深入调查,不断探索,尝试创新,对热点问题的研究从单一的经济分析转至交叉学科分析,并且积极服务教学。1993年,杨老师牵头主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出版,此书对人们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我对学生唯一的要求。”谈及培养学生的成长成才的经验,杨老师如是说。育人育理更育心,他始终坚信,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立业。陶行知曾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此番道理在杨老师身上得以体现。杨老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义已然进入新时代,在新时代背景下,则更需要众多“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人才,如此,唯有心怀德法,才能真正服务于党、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

顺应“以人为本,四个回归”的号召,杨老师强调,大学生仍处于需要广泛学习的阶段。教材要厚,讲授要精,教师应当深入难点、重点、热点,充分引导学生广泛阅读,使其拥有更大的自主学习空间。与此同时,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教师重视

基本理论、基本概念的讲授,深化概念,讲透理论,联系实际,说明现实,充分发挥指导作用。

求学路上,他把握机会,知恩感恩,牢记党和国家对他的栽培;土改时期,他深入群众,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想。故在谈及对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的热爱时,杨老师非常动容。“党和国家人民给我的太多了,而我能回报的却太少。”人生起落沉浮,对杨老师来说唯一不变的便是自己对党和国家的热爱,以及对教育事业的敬重之心。

“功勋两个字太重,我不敢当,但我敢说,我是一个爱党爱国者,我是一个好教师。我出生在农村,是农民的儿子,解放前是个失学青年,非常悲观。解放后是党和国家一手培养了我,送我上大学,读研究生,进高校升教授,结婚成家,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可以说,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就不会有我的今天,不会有我今天的一切。我很感恩,也很感恩,我非常热爱我们的党,热爱我们的国家。我热爱的感情已渗入血管,融入血液中。从事教学后,我教学认真,科研努力,热爱学生,桃李满天下。”

爱党爱国,是杨老师一生的信仰;忠于人民,是杨老师毕生的追求;育人桃李,则是杨老师口中,唯一能够报答党和国家人民对他培养之情的方式。“我老了,只有想到自己的学生们还在为党和国家人民奉献着,才能有些许安慰。”

教育家乌申斯基曾说,教师个人的范例,对于青年人的心灵,是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最有用的阳光。而杨老师的教育理念便是如此,浸润着对人生的感悟,一如阳光般闪亮而温暖,那是教育智慧和人性智慧的交融,是对于青年人的心灵而言,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的最有用的阳光。

(新闻中心大学生记者团 蒋丰荷)



武步云一辈子,我只弄懂了一个问题

武步云教授,男,1929年11月出生,祖籍内蒙古卓资县,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49年7月起先后在绥远省行政干部学校、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局、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西安政法学院、陕西中医学院工作、学习和任教。1979年回校任教,曾任政治理论系、行政法系主任,兼任陕西省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副总干事,陕西省法学会行政法学会总干事。1995年3月离休。代表作《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引论》《黑格尔法哲学:法与主体性原则的理论》《政府法制论》《法的本质的哲学思考》等。曾获国务院表彰的高等教育事业“突出贡献”者、司法部评选的先进教师等荣誉称号。我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行政法专业的主要创建人。2018年荣获“西北政法大学功勋教授”荣誉称号。

武老师是1929年生人,新中国成立之年来到我校的前身——西北政法干部学校工作。时至今日,武老师见证了学校的风雨变迁。

我校行政法学院,其前身是成立于1988年7月的行政管理(行政法)系,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全中国第一个法学系行政法专业,在我国行政法学科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2006年10月学校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后,根据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深化改革,正式成立行政法学院。而武老师,便是我校行政法系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任系主任。武老师为行政法学院的建立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其地位举足轻重。

组建行政法系之前的几年中,武老师曾担任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又担任了政治理论系主任。“我们有一批很好的教师。”武老师颇为自豪。但在政治理论系撤销后,这一批教师的安置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于是武老师与我校穆镇汉老师一同前往教委申请成立行政管理(行政法)系。

“到现在,行政法学院出来的学生,大概有一万多人了吧。”谈及行政法学院的发展成果,武老师将其归功于几代人的共同努力。而动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动人以行者,其应必速。行政法学院的发展,离不开以武老师为代表的老一届创始者的辛勤耕耘。

武老师是1929年生人,新中国成立之年来到我校的前身——西北政法干部学校工作。时至今日,武老师见证了学校的风雨变迁。

我校行政法学院,其前身是成立于1988年7月的行政管理(行政法)系,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全中国第一个法学系行政法专业,在我国行政法学科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2006年10月学校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后,根据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深化改革,正式成立行政法学院。而武老师,便是我校行政法系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任系主任。武老师为行政法学院的建立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其地位举足轻重。

组建行政法系之前的几年中,武老师曾担任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又担任了政治理论系主任。“我们有一批很好的教师。”武老师颇为自豪。但在政治理论系撤销后,这一批教师的安置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于是武老师与我校穆镇汉老师一同前往教委申请成立行政管理(行政法)系。

“到现在,行政法学院出来的学生,大概有一万多人了吧。”谈及行政法学院的发展成果,武老师将其归功于几代人的共同努力。而动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动人以行者,其应必速。行政法学院的发展,离不开以武老师为代表的老一届创始者的辛勤耕耘。

武老师是1929年生人,新中国成立之年来到我校的前身——西北政法干部学校工作。时至今日,武老师见证了学校的风雨变迁。

我校行政法学院,其前身是成立于1988年7月的行政管理(行政法)系,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全中国第一个法学系行政法专业,在我国行政法学科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2006年10月学校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后,根据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深化改革,正式成立行政法学院。而武老师,便是我校行政法系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任系主任。武老师为行政法学院的建立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其地位举足轻重。

组建行政法系之前的几年中,武老师曾担任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又担任了政治理论系主任。“我们有一批很好的教师。”武老师颇为自豪。但在政治理论系撤销后,这一批教师的安置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于是武老师与我校穆镇汉老师一同前往教委申请成立行政管理(行政法)系。

“到现在,行政法学院出来的学生,大概有一万多人了吧。”谈及行政法学院的发展成果,武老师将其归功于几代人的共同努力。而动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动人以行者,其应必速。行政法学院的发展,离不开以武老师为代表的老一届创始者的辛勤耕耘。

武老师是1929年生人,新中国成立之年来到我校的前身——西北政法干部学校工作。时至今日,武老师见证了学校的风雨变迁。

我校行政法学院,其前身是成立于1988年7月的行政管理(行政法)系,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全中国第一个法学系行政法专业,在我国行政法学科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2006年10月学校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后,根据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深化改革,正式成立行政法学院。而武老师,便是我校行政法系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任系主任。武老师为行政法学院的建立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其地位举足轻重。

组建行政法系之前的几年中,武老师曾担任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又担任了政治理论系主任。“我们有一批很好的教师。”武老师颇为自豪。但在政治理论系撤销后,这一批教师的安置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于是武老师与我校穆镇汉老师一同前往教委申请成立行政管理(行政法)系。

“到现在,行政法学院出来的学生,大概有一万多人了吧。”谈及行政法学院的发展成果,武老师将其归功于几代人的共同努力。而动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动人以行者,其应必速。行政法学院的发展,离不开以武老师为代表的老一届创始者的辛勤耕耘。

武老师是1929年生人,新中国成立之年来到我校的前身——西北政法干部学校工作。时至今日,武老师见证了学校的风雨变迁。

我校行政法学院,其前身是成立于1988年7月的行政管理(行政法)系,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全中国第一个法学系行政法专业,在我国行政法学科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2006年10月学校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后,根据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深化改革,正式成立行政法学院。而武老师,便是我校行政法系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任系主任。武老师为行政法学院的建立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其地位举足轻重。

组建行政法系之前的几年中,武老师曾担任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又担任了政治理论系主任。“我们有一批很好的教师。”武老师颇为自豪。但在政治理论系撤销后,这一批教师的安置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于是武老师与我校穆镇汉老师一同前往教委申请成立行政管理(行政法)系。

“到现在,行政法学院出来的学生,大概有一万多人了吧。”谈及行政法学院的发展成果,武老师将其归功于几代人的共同努力。而动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动人以行者,其应必速。行政法学院的发展,离不开以武老师为代表的老一届创始者的辛勤耕耘。

武老师是1929年生人,新中国成立之年来到我校的前身——西北政法干部学校工作。时至今日,武老师见证了学校的风雨变迁。

我校行政法学院,其前身是成立于1988年7月的行政管理(行政法)系,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全中国第一个法学系行政法专业,在我国行政法学科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2006年10月学校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后,根据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深化改革,正式成立行政法学院。而武老师,便是我校行政法系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任系主任。武老师为行政法学院的建立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其地位举足轻重。

组建行政法系之前的几年中,武老师曾担任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又担任了政治理论系主任。“我们有一批很好的教师。”武老师颇为自豪。但在政治理论系撤销后,这一批教师的安置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于是武老师与我校穆镇汉老师一同前往教委申请成立行政管理(行政法)系。

“到现在,行政法学院出来的学生,大概有一万多人了吧。”谈及行政法学院的发展成果,武老师将其归功于几代人的共同努力。而动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动人以行者,其应必速。行政法学院的发展,离不开以武老师为代表的老一届创始者的辛勤耕耘。

武老师是1929年生人,新中国成立之年来到我校的前身——西北政法干部学校工作。时至今日,武老师见证了学校的风雨变迁。

我校行政法学院,其前身是成立于1988年7月的行政管理(行政法)系,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全中国第一个法学系行政法专业,在我国行政法学科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2006年10月学校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后,根据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深化改革,正式成立行政法学院。而武老师,便是我校行政法系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任系主任。武老师为行政法学院的建立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其地位举足轻重。

郭志琦:学术需要博览群书,也需要学以致用

郭志琦教授,男,1935年5月出生,祖籍陕西长安,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51年起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机要处、中央办公厅机要局、西安政法学院法律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班、西北政法学院、西安医学院工作、学习和任教。1979年6月回校任教,曾任政治理论系主任、经济系副主任、经济贸易系主任,兼任陕西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陕西省经济学会理事等职。1998年9月退休。代表作《竞争学》《市场经济理论史纲》等,我校政治经济学学科主要创建人。2018年荣获“西北政法大学功勋教授”荣誉称号。

郭志琦教授的采访约于老师的家中,郭老师虽已年过八旬,却是容光焕发精神抖擞,坐在我面前侃侃而谈,令人顿时肃然起敬。对于荣获“功勋教授”称号,郭老师非常激动,并向学校表示感谢。光阴荏苒,从1958年进入西安政法学院学习到1964年研究生毕业回校工作再到如今,郭老师和西北政法大有已有60余年的缘分,他在我校创建了经贸系和市场营销、国际贸易专业,制定了法商结合的特色教学计划,参与我政治经济学研究生硕士点的申报工作。一路走来,郭老师见证了学校的艰难坎坷,也是学校辉煌事业的见证者。

回忆起数十载求学路,从西北大学到中国人民大学再到西北政法大学,从法律系到经济系,郭老师认为有两个时间段是他人生关键的转折点。其一是在西安政法学院学习时,学校开设了经济学、政治学等新专业,他由于学习成绩优秀被学校安排为提前毕业生并分配到经济系当助教,在此期间,郭老师不忘刻苦学习,并于1961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说史专业研究生班,从此,郭老师便走上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道路;其二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期间,安稳的社会环境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学习时间,大量的学习资源,郭老师回忆道,在研究生学习的三年里,除了去公社的十天,其余时间都在看书、学习,这也为他之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这正是为这段经历,使得郭老师明白认真读书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在他看来,阅读量是学术的基础,只有量的积累才会引起质的飞跃,知识的积累不仅是丰富自己,拓宽视野的过程更是形成积极向上的正确价值观的过程,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科学、理性思维方式的成型。同时,对于学术的追求不能只囿于课本,论文、著作、期刊都是获取知识的理想来源,在读书的同时更要学会思考,将知识转化为自己的东西。

郭老师在经济学、政治学领域颇有建树,他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为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说史类、市场经济理论及市场经济理论史类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和批判新自由主义干扰等三类,并以独创性、针对性、严谨性的特点在社会各界享有较高评价,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易风将郭老师的著作《市场经济理论史纲》评价为“我国国内出版的第一部系统研究市场经济理论发展史的专著”,出版编辑则认为该书“填补了我国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同时郭老师的部分论著被国内著名刊物转载,为其他学者的理论研究提供论证基础。

总结自己从教的三十余年,郭老师说自己一共做了三件事情,备课授课、创办新专业和学习。“读书思不多,思患不明,患足已不学,既学思不行。”读书学习,只担

心学得不够多;领会要义,只怕悟得不透彻。学习最怕产生自满心理,也最怕已经学了的东西不能完全掌握,不去付诸实践。这是郭老师对于学习的态度,正所谓“学海无涯学无止境”,所谓“顿悟”并非空穴来风,它是活动主体长期沉潜于研究对象之后豁然开朗的自然结果。好学者,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学者,两者兼并,因“爱”学之,学无止境。

在郭老师看来,学术需要博览群书,也需要学以致用,要学习去读懂“无字之书”,这种“无字之书”源于生活,既有理性的探索,也有朴实的智慧,但读懂这种书并非易事,必须独具慧眼,步步留心,时时在意,善于观察、总结、思考,才能在平凡之中捕获其奇特之奥义。把“无字之书”与“有字之书”相结合,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用理论经历过去的实践,创新现在的实践,二者紧密结合循环往复才能使学术能力得到升华。为了研究服务业竞争问题,他除了阅读大量相关书籍资料,还专门到珍珠泉等服务部门进行实地调研,并接连用几个晚上的时间到火车站广场考察。

“实事求是”是郭老师对于学术研究的态度,也是他处事的准则。“心是一颗明珠,以物欲障蔽之,犹明珠而混以泥沙,其洗涤犹易;以情识衬贴之,犹明珠而饰以银黄,其洗涤最难。故学者不患垢病,而患洁病之难治;不畏事障,而畏理障之难除。”学术研究贵在求真、求实,做人亦是如此,理论与实践并重,知识也与品德并重,惟诚可以破天下之伪,惟实可以破天下之虚,不用怕障碍混淆了我们的心理,因为总有一天可以拨云见青天;应该怕的是我们心灵把握了错误的原则,那就很难认清问题的根源。

有言道:“学者是天生的学者”。所谓“天生”,不是指“天才”,而是指他志向在此,不被任何人任何事所牵绊,虽千万人吾往矣,于是一路走来,他带着那颗颗赤子之心成为“天生”。在采访中,郭老师谈及了往事,那是一个充满变数与未知的时代,社会制度逐步建立,学术领域百废待兴,正是像郭老师一样的那些“天生”学者一点点铸就了我国各类学术的基础,他们不名为名利,不畏艰难,不管夹岸的高山,平远的田畴,巍峨的城郭,冷落的村庄;也不管烈日风和,风雨萧瑟,云卷舒舒;只是不舍昼夜,为心中所追求浩浩荡荡地向前流去,默默向世间提供舟楫灌溉之便。无问西东,只问初心。

(新闻中心大学生记者团 刘欣悦)



穆镇汉:把培养人作为第一目标

穆镇汉教授,男,1929年10月出生,祖籍江苏无锡,经济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50年起先后在苏南苏州行政干部训练班、苏南公学、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西北大学法律系、西安政法学院、西北大学学习和工作,1979年回校任教,曾任西北政法学院副院长、院长兼党委书记,兼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法学会理事、陕西省法学会会长、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1995年11月退休。代表作《商业法教程》《劳动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国有资产法的几点思考》《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等,我校经济法学学科主要创建人。2018年荣获“西北政法大学功勋教授”荣誉称号。

初次见到穆老师便觉得亲切,他身体健康,思维灵活,不必多言便能让人感受到岁月沉淀给予他的睿智。

经历过侵华战争的动荡年代又因双亲患疾他与大学学府遗憾错过,幸而在解放后进入苏州的培训学习班学习,后进入苏南公学工作,因为优异的表现而被推荐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一名大学生,自此开启了他的法律道路。经过不断深造,其后他被分配到西北大学法律系,成为一名大学老师。由于国家政策与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他不仅教过法律,还自学了经济政治哲学等,为建国初期的人才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唯有自己理解的知识,熟练掌握并运用自如,形成一套自己的认知体系之后,才能更好的教授学生。”秉持着这样的教学理念,他兢兢业业,将绝大多数的精力投入到教学事业,整整五十年没有节假日,甚至没有周末休息。正是因为穆老师把教学的品质放在首位,才能够出色地胜任每一项教学任务。如今穆老师的桃李早已带着他心底最初的法律愿望遍布祖国大地,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时光荏苒,穆老师从经济法教研室主任到经济法学院副院长,再到经济法学院院长后来又兼任经济法学院党委书记,虽然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但身为我校第一位被评为副教授的老

师,他从未忘记自己身为一名老师的初心,心中从未放下教学事业,从未忘记培养人才的重任。

在对比考察了中国与日本在政治、经济、教育等多方面的差异后,穆老师认为学校应当扩大规模培养法律人才。一番申请,他争取到了国家的财政支持。他主持加盖了学校的教学楼、食堂、宿舍楼,给师生们营造一个良好的校园环境,在全国扩招,招生范围从以前的六个省扩展到二十四个省;新设行政法学院、公安学院等……为了提高学生专业水平,穆老师还提出增加专业选修课、专业类、体育课等,并且制定新的教学方案,安排新的教学计划,形成了“法学为主,多学科,多层次”的教学体系以适应国家社会的发展需求。

身为院长,穆老师肩上的担子比之前纯粹做老师时沉重了许多,千头万绪的工作没有让他手足无措,反而让他更加坚定的把教学质量作为衡量教学效果最重要的标准。在解决师生之间存在的问题时,虽然很多时候令他感到困难,但穆老师总能找到合适的办法。虽然早已退休,但他仍然心系自己承担的社会工作,参与了很多地方性法规的起草、修改和补充,为地方立法作出了重要贡献。

受到同为教师的父亲的影响,穆老师认为教师应当以学生为中心,将育人作为首要目标。当下社会,虽然教师们面对着多方的压力与诸多的诱惑,但是既然选择成为一名教师,就要学会平衡种种矛盾冲突,在适应复杂环境的同时,更要踏踏实实做好教师的本职工作。穆老师希望所有教师明白,理解是记忆与运用的基础,而记忆与运用则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方式。“只有足够专注,真正地深入研究,才能教给学生更多知识。”

大学生作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之一,应当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明确自己的定位,在学习的过程中要能够自主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穆老师希望当代大学生能够利用大学四年时光“广博地学习”,他进一步阐述,所谓“广博”,是指广泛地学习知识,专业地钻研学问。大学生应当在大学期间养成良好的学习方法与学习态度,学习到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基本方法。

对于获得“功勋教授”这一荣誉称号,穆老师谦虚地表示自己只是那些奋斗半生仍孜孜不倦的老教师中的一员,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十分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有许多人退休以后仍然致力于学术科研。他也希望“功勋教授”这份荣誉能够鼓励当代教师坚持心中的信念,不畏苦,潜心育人。

“要重视年轻人,给年轻人创造机会和条件,相信他们,今后是他们的舞台。”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深入人心,穆老师的每句话都像给他人的感觉,真挚温暖,不泛空洞。多年知识阅历的积淀让他对教书育人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也有着更多对自我的要求,对教育事业怀着更多的关心,这大概就是一个老师最初的样子吧,一片赤诚,终身热爱,将满腔热忱源源不断的献身于教育事业。

(新闻中心大学生记者团 朱墨清)

杨永华:堂堂正正做人 圆圆满满治学

杨永华教授,1937年2月出生,祖籍山东东营,法制史专业首批硕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62年北京政法大学法律系毕业,1965年北京政法大学法律系中国法制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先后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西北大学工作,1979年到我校工作,曾任法律系法制史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法学会执行会长、陕西省学位委员会委员等重要学术职务。代表作有《中国法制史》《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中国法律思想史》等,我校法制史学科主要创建人。因为在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领域的开拓性贡献,2012年获“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荣誉称号。2018年荣获“西北政法大学终身成就奖”荣誉称号。

杨老师出生的1937年,是一个战火纷飞、民族危亡的年代。少年时期的杨老师怀揣着为中华崛起而努力读书的远大理想,1957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读本科,在大学期间他更加刻苦,如饥似渴的汲取着知识的养分。1962年,本科毕业后,杨老师在北京大学法律系继续攻读中国法制史方向硕士研究生。研究生期间,张国华、肖永清和张友渔等诸位导师的言传身教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张友渔老师勉励他要树雄心、立大志、为国争光。这一席话像种子一样在杨老师心中深深埋下,从那以后,他便确立了要填补中国革命法制史研究空白的学术抱负。

自1979年学校复校起,杨老师正式调入我校任教直至2002年退休,多年以来,他一直砥砺前行于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领域,他和方克勤教授一道走访查阅了大量关于陕甘宁边区法制的第一手史料,在认真细致地整理这些资料的同时,他们还跑遍了当时陕甘宁边区的所有行政区域,进行实地考察,采访健在的陕甘宁边区司法干部,开展了有创建意义的口述史整理,充分保证了资料的真实性。在上万手史料的基础上,经过数十年皓首穷经的埋头研究,杨老师团队成功填补了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的空白。

杨老师曾参加“六五”社科重点项目“中国法制通史”、“七五”社科重点课题“八五”重点出版项目“中国法律思想通史”以及“九五”社科重点课题“中国共产党廉政法制史研究”等重大科研项目。先后出版了《陕甘宁边区法制史》《陕甘宁边区法制史(诉讼法分卷)》《陕甘宁边区法制史(宪法政权组织法分卷)》《中国法律思想通史(现代卷)》《中国共产党廉政法制史研究》等一系列著作。其中:《陕甘宁边区法制史》(宪法政权组织法分卷)获得了“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法律思想通史(现代卷)》获得了“陕西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共产党廉政法制史研究》获得了“陕西省第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除此之外,杨老师还发表论文八十多篇,对陕甘宁边区法制的内部结构进行了详细阐述,并对陕甘宁边区法制的主要成就进行了提炼与总结,为学界关于

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杨老师的课堂生动有趣,激情四射,学生们都非常喜欢听他讲课。在日常教学活动中,杨老师尤其注重对学生基础知识的培养,认为学好法律的关键就要打好法学理论基础。杨老师经常不厌其烦地给学生讲授学习方法的重要性,督促学生们认真学习。对于有志于学习法制史方向的学生,杨老师还用课余时间为他们补课,为他们考研、考博联系相关院校导师,努力帮助和提携学生。杨老师还非常注重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尤其重视对学术的传承,他不遗余力地为青年教师们创造各种各样的条件,帮助他们确定研究方向,鼓励申报课题,解答疑难问题,为他们争取参加学术讨论会的机会。经过杨老师等学科前辈的共同努力下,西北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科成为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硕士点之一。

作为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的“拓荒者”,杨老师一直扎根于西北地区,为西北地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其一生的心血。即使在老年时期,杨老师仍然不断看书学习,吸收知识,查阅资料,践行着“活到老学到老”的真谛。“闲不住的话就继续培养人才”,杨老师经常这样说。对于登门求教的年轻教师、博士生和硕士生,他都不吝赐教,以其数十年的渊博知识和学术素养对学生们阐发自己的见解,尽力去指导他们。“只有堂堂正正做人,圆圆满满治学,求实、求是,求是,坚守治学信仰,虔诚守护学术殿堂这片净土,才能不断在学术钻研中推陈出新,为理论创新添砖加瓦。”这是杨老师一生践行的治学之道,也是杨老师学术生涯以及为人处世的真实写照。

2015年,已经退休十多年的杨老师和马成、韩伟两位年轻学者一起以《陕甘宁边区民法文献整理与研究》为题申请获批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课题,2016年11月,课题以优秀等级顺利结项。在项目结项报告基础上,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系列成果之三——《陕甘宁边区法制史(民法篇)》于2018年3月由法律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杨老师构思的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蓝图,接下来还有《陕甘宁边区法制史(刑法篇)》和《陕甘宁边区法制史(诉讼法篇)》,虽然因为身体原因,他可能不能再直接参与研究,但他希望后辈学者能够帮助他继续完成这个学术心愿。

(刑事法学院 马成)

